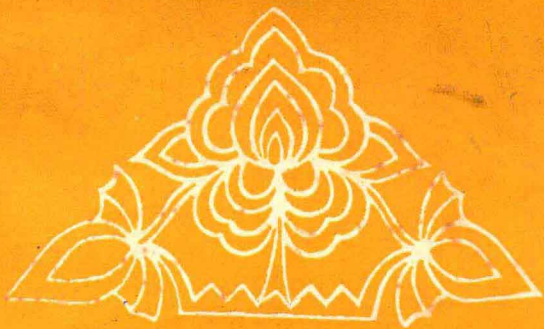


著名作家 谈文学创作

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目 录

根	丁 玲 (1)
长篇小说创作体会	杨 沫 (9)
论文学创作的真实性	白 桦 (15)
创作和生活的关系	茹志鹃 (33)
中国新诗发展的广阔道路	晓 雪 (50)
电影漫谈	王 蓓 (63)
创作漫谈(上 下)	祖 慰 (77)
几点体会	王安忆 (113)
愿文学之林常绿	张昆华 (127)
作家答问	(127)

根

丁玲

这是个答辩会。学生毕业的时候，要开个会，很多老师听他讲论文回答问题。我现在在这里也好像是参加答辩会，不止台下有老师，台上也有老师，大家都看着我，我不一定能及格，但没有办法，得讲。

讲什么呢？就讲昨天开幕式上我讲到过的花，说你们都是花。

花有各种各样，但不管什么花，都得有根。没有根，花就要萎谢，再浇水也不行。就是一棵大树，不管你有十丈高，长得再茂盛，如果伤了根，树也就要凋谢了。

花有各种用处，有的花可以当药，有的花主要供观赏。但是再漂亮的花，把它摘下来，供起来，有人捧它，而且捧得很高，但它如果没有根，几天就完了；只有根扎得很深才能保持长久，今年谢了，明年还会开。我们这个根要扎在什么地方呢？要扎在人民里面，越深越好。怎样才能扎在人民中间去呢？要你的东西是真正代表人民，要人民喜欢你，这样，你才有了根。这样那怕一时没有人赏识你，没有人捧你，甚至花落下去了，但一定还会开的，因为你这个根扎得好。

做一个作家很难呵！就好像唐僧到西天取经有九九八十一难。扶持你的有，无心伤害你的也会有，甚至扶持你的有时也会伤害你。你本来长得很好，但他把你这样那样整一整，结果把你整伤整死；也有拔苗助长的，幼苗本来长得很好，但有的人嫌你长得不高，长得慢，把它拔一拔，就把它拔得离开土壤了。

我们要真正的和人民一致，感情一致，对事物的判断一致。人民和国家是一致的，我们要爱这个国家，一个不爱自己国家的人，再好，也是没有出息的，没有前途的。

我在国外碰到过一位来自台湾的诗人，他写的诗很好，写了很多爱国的诗。但是，这位诗人爱的是杜甫时代的国家，是李白、屈原时代的国家。我们不仅要爱屈原、李白、杜甫时代的国家，更要爱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。假如不爱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就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人民的可爱。

文学家、作家，都有爱，有恨。他们爱什么，恨什么是明朗的。我

们要爱我们的社会主义，爱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事业，不让一些脏东西来污染我们；我们要把爱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一种本性。我们要围绕着我们的国家、人民、社会主义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去爱、去拥抱，或者去恨、去攻击扫荡，要有这样一股热情。

这几年，我觉得我们的文艺作品很繁荣，但文艺思想是比较混乱的。青年人里面有混乱，中年人里面也有，老年人里面也有，领导上有时也有人不够清醒，随便说话，更多的人是不管，或看风，跟风，东风来了就往西边跑，西风来了就往东边跑，没有主见，摸棱两可，闪烁其辞，该说没说，该管不管，这有害于我们的文学事业，有损于我们的国家，对我们人民没有好处。

很多人讲自由化。我想想自己，我是自由的，我这个人，还是敢想的。有什么就说什么，说错了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是对的，我可以接受，可以改正。问题是自己要站稳脚跟，站稳脚跟，就很可以自由。放风筝手里还得有一条线，我们这条线还在地球上，在我们这块国土上。无边的自由我是不赞成的，而且我相信那些标榜自由的国家决不是无边的自由。

我刚才讲，我们要敢想。不是你教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。今天搞文明礼貌，我就赶快写文明礼貌。即使是写文明礼貌你应该写在之前，等到今天开过会才写，那是小学生嘛。你应该站在运动的前面，老早就有一定的看法，有主见，不是空想，是从人民中体会出来的，从社会生活里面体验出来的。

现在，有一些年青人说：“我不要生活，我也不要什么政治，只要我自己就够了。”其实，为人民，为社会主义就是政治。他不愿意这样，他只喜欢写自己一闪的灵感，但灵感从哪里来？我觉得灵感也是从自己长期对生活，对社会的态度来的，是从作者和人民的关系中来的。

去年我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五代同堂，振兴中华》。这篇短文从历史上说到我们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。我说现在，我们有五代人都活跃在文坛，都在为国家、为我们的“四化”而努力。第一代我讲了叶圣陶、谢冰心，八十多岁了，现在还在开会，写文章啊。在座的蹇先艾同志那天对我说：“你把我放在第一辈，我很惭愧。”因为他还在活动，还在工作，还在为人民而努力，所以我很容易想到他。

我在文章中说，我们这五代人都从政治运动中出来的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才，生就会写文章。我们的文学家是从政治里面产生的。这是历史事实。“五四”运动产生了我们最早的新文学。从这个

运动涌现出来的第一代作家，至今有的牺牲了，有的老了。冰心就是从这运动里出来的。她写了许多进步的有影响的作品，后来她到外国去了。建国以后，她回到国内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又有了和人民结合的条件，因此，她今天的作品，不只保持了她的过去文字优美清新的特点，而且饱含着时代的气息和歌颂新中国的激情。

我在美国曾收到一位二十年代就写文章的老作家寄来的书，这是他过去写的。鲁迅曾很器重他。如果他留在国内，他会有作为的，但是，他去台湾了，他不是跟国民党走的，是老早就去了的，后来他回不来了。他在台湾没法活动，没有政治保障，只能教书糊口，生活困难，文学生命也濒临枯竭。还有一个女作家，是北伐时候的女兵，写了一本小说叫《女兵日记》。但她后来离开了国家，脱离了我们的政治和人民，她就没有根了。没能再有新作为。所以，人民的政治生活，我们脱离不得，脱离就没有根了。只有把根扎在人民里面，跟人民一道才有前途。我昨天说，我是一棵草，草是能经风雨的，大风一来，它没办法，要低低头；风一过，它头又抬起来了。我承认，我是草，不管你把它扔到哪里，只要沾着一点泥土，就是在石头缝里也会长呀，因为它能吸收营养。我们在人民里面，随时都能得到营养。如果你真正有人民的感情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好的东西，象喝了酒一样醉。十年动乱中，我在抄家挨打的时候，在只有六平方米大的房子里，晚上造反派把我屋里的电灯泡拿走了，还想在暗中再打我一顿。就在这样的时刻，一个跟着那些造反派进来的人，顺手把我拉到他的背后。所以，尽管我挨了打，东西被人抄走了，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，忽然有人这样拉我一把，这是我们的宝贝，是最美好的东西。我们北大荒农场的那个文化宫比这个礼堂还大，满礼堂的人，造反派让我跪在台上，再踏上一支脚。在那样的时候，看管我的两个女造反派，走上前来，让踩我的那个造反派让开，说：“请你们走开，我们来接班。”他们走开了，她就骂起来：“丁玲，你这个坏东西，剥削人一辈子了。你站起来，抬起头来，叫大家看看你那个丑样子！”那我就站起来，抬起了头，舒了一口气，你看她聪明不聪明？那时她们使我脱离困境，同时培养了我对人民的感情，我再也不能忘记她们，我什么时候都会想念他们。而她们，不仅是一两个人、而是代表了我们的劳动人民。从他们那里，我就在黑暗、痛苦、绝望当中看到希望，得到温暖，这个伸来的手，这一句话，比千斤还重啊！

我很感谢有些“左”得可爱的同志，五八年彻底把我打下去，使我从劳动人民里面得到好多过去没有得到的东西，使我的感情有新变化。但是，在知识分子里面同样也有很多正直的人。我在五五年戴了

反党集团的帽子，全国皆知。但是就在那样的空气底下，当时的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我的长篇小说中的八章。以后，我收到了很多来信，这当中就有在座的李乔和洛汀的信，他们对我的小说提了意见，这很不容易啊！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的时候，我在农场得到通知，（我被开除了党籍，取消了级别，但还保留了作协理事的名义）通知我到北京开会，来可以，不来也可以。我还是来了；当然很多同志都不理我。但是，李乔理我了。他跟我点头，说：“你来了，还好吗？”很少有呀！尽管有人指责他，为什么跟丁玲讲话？但他还是理我了。在那个时候，这就是给我的一捧土，就是鼓励我活下来。这是我们人民固有的美德，看到这点，我就愿意高高兴兴地为人民中这种美好的东西活下去，吃苦也甘心。假如我们不从生活里面去发现这种东西，认为无所谓，那我们看到的只是黑暗。黑暗有没有？有。说没有黑暗，只有好东西，这是哄人，也是哄自己。不过，我不承认别人封我为“暴露黑暗的头子。”我们要看到黑暗，弄清黑暗是怎样产生的。一个巴掌就把人打死了，不是黑暗吗？可是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受过点委屈，就认为黑暗到顶了，再没有希望了。一叶障目，这哪行啊！我们要自由，要真正到生活里面去，要把根子扎在人民当中。

前不久，在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，大家谈到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我也读了这篇小说，但我没有哭，这自然不是说这小说不好，不动人，不能使我流泪，只是因为我没有眼泪了。“腊炬成灰泪始干”嘛，都流完了。很多人看到我，总要说：“你的几十年生活，真是坎坷。”如果没有这些坎坷，我哪里懂得这么多哟。刚才，王梅定同志提到的杜晚香，她是我的一位老师。这些人教育了我，教我怎样做人，怎么处世，怎么爱人，怎么有志气，我不会忘记他们的。

这一次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我来云南，《个旧文艺》邀请我到个旧，参加讲习会，我很满意，很欣赏《个旧文艺》能够做这样一些有益的工作。他们一个地方刊物，能够吸引和组织这么多人来开会、讨论、学习、提高，这要人做事的，他们做了许多工作。

我向来赞成搞文学的人要学习。但我自己却学习得不好，没有有系统的，有计划的读书，而且读的书比较杂。读了一些翻译的文学书，于是有人说我受了福楼拜的影响，又说受了莫泊桑的影响。上个星期，一位同志来信，要我开个书单给他，问我读了哪些外国书，受了哪些人影响？我给他回信说：你别干那个冤枉工作了。我只读了一本书——中国社会。

这几年，我说我是文艺战线上的新兵，不是老兵。从二七年开始写作起我是老兵，从七九年回到文坛我是新兵。当中，我有二十多年

的空白。把我打成了右派，开始还可以看报；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看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，很多事情不知道，闭塞得很。七九年回到北京，大开眼界，啊！这么多老师哟。所以说，我是一个新兵。蒋子龙的那个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我写不出来，他有那么多生活，我没有，我不了解那些青年人，我落伍了，我应该以这些青年为师。他们的作品写得很好。你们这里面也有人发表过好的作品。因为你们在生活里面，有自己的感受，有新的东西。你们的感受很敏锐，又都有一定的文化，可以写出好的作品。我们的文坛是好的，充满了朝气，出现了那么多青年作家，写的东西都很好，如蒋子龙，就一直没离开过工厂。自然，也有一些作品我觉得不好，不健康，有的语言很粗俗。人民里面有好的语言，也有丑的语言。我们向人民学语言，人民也从我们的作品学习语言。我们到人民中去，学习什么样的生活和语言，自己要有分析，要掌握好。

我们要引导青年对生活发生兴趣。许多人对生活有兴趣，但有些青年为什么没有呢？他们好象什么都看透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然，受了“四人帮”的毒害。现在怎样帮助他们呢？我们就要到社会里面去，详尽的了解社会，了解青年。要有那么一个决心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？要敢于下地狱，看黑暗。现在很多青年团组织、很多人都在这样做。我们要看社会上很多东西，我们一定要学习，学历史、学政治、学社会，学思想方法，学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，要学很多的东西。你一学就懂得了，就会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，你就不会灰心了。

我们的社会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，现在封建制度垮台了，三座大山倒了。我去年回湖南，看到我们那个家族的族谱，我那个家族从周公时就有人当官，只有元朝没有人当官。辛亥革命，这个封建家族没垮。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好极了，建建家族彻底垮台了！这个家族的后代都成老百姓了，都是劳动人民了，多好啊！我对他们说：从前，尽管我们一姓、一家，我把你们当仇人。现在，你们都是劳动人民了，我们才真的是一家了。

封建制度虽然垮了，但是留在我们脑子里的封建思想，习气还很多，很严重。六十年前，我跑到上海追求革命、反封建，六十年后，仍然要反这些东西。许多封建恶习还根深蒂固套住我们的脑子，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。譬如妇女问题，我们的宪法上规定了男女平等，同工同酬，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。但是，妇女问题还是很多，思想意识里面的封建余毒还很多，而且经常表现出来，比五十年代的问题复杂得多了，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。

现在的青年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。我们那一代青年大致有两种。一种是要升官发财的；一种是要革命的。革命的青年没有什么个人打算，既不想当官，也不想发财，而且毕业就是失业。路只有一条：破釜沉舟干革命。现在年轻人，我觉得你们是幸福的。那时学写作，谁给你办讲习班啊！我们写文章只有一个想法：我那篇稿子能卖出去，拿一笔稿费，把下月的房租交掉就好了。

青年中有很多刻苦读书，认真学习的，他们真正是新一代。但是不是也有另一种：图轻巧，贪便宜，怕吃苦，不用功的？我们搞文学的有一个重大责任——怎样引导青年。我们不能脱离政治，但这不是说政治搞什么，文学便搞什么。不要把关系看得这么简单，我们曾经写过一些东西，都是紧跟政治，政治需要什么，就写什么，不都是从心里出来的。文学和政治是并行的，都是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殊途同归，相辅相成。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政治是一种推动，甚至是启发。

我们要排出一切不好的东西，尽可能避免走弯路。现在，有一部分青年喜欢夸夸其谈的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以为凡是外国的什么东西，都是好的。作品是外国的好，什么长头发、小裤腿、高跟鞋、蛤蟆镜都好看。我曾问过一位日本作家，日本男人留长发是因为美呀，摩登呀，还是因为理发费贵？他说：“理发费太贵，理发贵！”还说：“中国理发便宜，几毛钱理个发。”

外国的文学作品，有些是很好的，思想倾向、表现技巧都比较好，值得我们介绍、借鉴。但有些作品，特别是某些现代作品，是西方现代工业高度发展，精神文明极度空虚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一些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，看不到力量，无法自拔随之产生的迷茫、失望情绪的反映。对这一类的作品，我们可以介绍一些，知道一点，确有长处，也不妨借鉴，但要研究滋生他们的土壤，不必为之吹嘘、标榜，或东施效颦用作自己写作的榜样。

我国的文学土壤比西方国家肥沃得多，我们的生活比他们的丰富得多。我们正在我们党的领导下，团结奋发，改正过去的错误，克服存在的困难，信心百倍地建设中国式的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。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应该深深地、牢牢地把根扎在十亿人民中，扎在神州大地上，才能产生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品，丰富世界文学的宝库。

那天蓝芒同志叫我为刊授学员的习作选集《文学林》写两句话，我写了：“写一本自己的书，用自己的生命去写一本书。希望你们，

也勉励自己。”这话没有写完全，应该是写自己的一本好书，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写一本好书，而且是写自己的，不是抄人家的，也不是模仿人家的。我是按自己的主意去写书。

中国现在有个怪现象，三十年代我们不要了的东西，批评过的东西，外国有人叫好，说这是艺术。因为这里面没有政治，只有趣味。外国人欣赏、说好，我们中国就有人也跟着说好，跟着崇拜，以为真好，把这当成自己模仿的榜样。奇怪得很！前几年在北京看一部香港电影，观众反映，影片太好了，比我们的好。我很生气。影片把唐伯虎写成个小白脸、小流氓了，有什么好呢！一般人说好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但是，我们文艺界里一些比较老的人，对自己参加批评过的这类东西，现在也变得喜欢了；我实在难受。我实在希望我们的年轻作者，努力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和欣赏水平，对一些坏作品要增强免疫力，可以不受污染。

另外，我再讲一讲，因为学习西洋的好东西，于是就盲目地认为西洋的什么都好，我们自己的什么都不好，这种民族自卑感是要不得的。文艺界有同志嫌自己过去的东西太土了，就这个问题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《浅谈“土”与“洋”》；过些日子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，请大家提出意见和批评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我们的新文学向来都是洋的，从“五四”以来都是洋的。土，是指古时候《三国演义》这些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，说唱。但后来，这些我们没有人搞了，都搞新式的短篇小说，长篇小说。现在有的同志要洋，我不反对；搞“意识流”，就“流”吧，搞朦胧诗，大家看着迷迷糊糊的也可以。但是，我说过好多次，几十年来，自己很后悔一件事，就是一开始写小说就走的西洋的路。现在湖南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文集，我翻看自己过去的作品都不顺眼，哪来那些别别扭扭的话。老百姓说话痛痛快快，直来直去，清楚明了，我写小说却把后边的话说到前边，把前边的话说到后边。我想，如果我能从中国的民族形式，民族传统出发，那该多好啊！现在，有哪一本书能超过《红楼梦》？外国的也超不过；也超不过《三国演义》。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确是一部世界名著，当中也有三分之一都是说教。美国一位朋友托人转告我，希望我写出一部托尔斯泰来，或写出一本《飘》来。朋友的这种好心，我自然感激。但是《飘》有什么好呢？无非写了两个野性的人物。大多数中国人不一定喜欢野性人物，比较起来，可能更喜欢敦厚的人物。

我们应该提倡学习我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。我们现在最好的书，也还没有超过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。去年北

京召开军事题材创作会议时，我对几位部队的同志说，要研究《三国演义》，人家写了那么多不同的历史人物，那么复杂的战争。每个战争都不雷同，都写得那样有声有色。八〇年梁信写电影剧本《赤壁大战》，现在不知开拍没有？这故事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谁都会去看看。最近我到湖南、云南，在偏远城市，散步街头，常常看见一二十个男女青、少年，围着地摊，坐在小板凳上，专心翻阅小人书，连环画。这些书大部分是历史故事，是根据《三国》、《水滸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》等改编的。我们应该好好研究，为什么这些书能如此吸引读者？我以为，外国的各种表现手法，我们都不妨学习，参考，借鉴，但如果忽略了向本民族的传统学习，那将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失策。

我们要走中国的路，要把民族传统中好的东西继承下来，写人、写社会、写人情世故，写现代的事，而且写得有思想深度。我们应该走出自己的路，不要盲目模仿外国，我们是几千年的文化古国，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，我们要继往开来，共同努力。

今天讲了许多，当中如有一两句可听的，就算尽了我一点力，做了一点事。完了。

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于个旧市

五月十八日根据记录整理定稿

长篇小说创作体会

杨 沫

同志们，我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个旧市，跟个旧市广大的文艺爱好者，还有《个旧文艺》的优秀刊授学员，还有各行各业的同志们见面，心情是很激动的。尤其是《个旧文艺》组织的几十位优秀学员，他们有来自海南岛，有来自黑龙江，不远万里来到个旧市，来学习、探讨、交流创作方面的经验，我很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。还有州、市、云锡的领导同志，都来参加这个会，来听我这个讲话，我是非常感谢的。

我是搞文学工作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我只能谈谈个人学习写作，主要是写长篇小说方面的一些体会。我心里有些不安，因为我谈专业性的东西多一点。对广大的各个方面不是搞文学的同志也许不大合适。但我听说个旧市有很多的同志很爱好文学，业余喜爱文学，我很高兴，我就可以对题地谈谈创作方面的问题了。

我一共写了两部长篇小说，一部是《青春之歌》，一部是《东方欲晓》。《东方欲晓》分三部，现在只出版了一部，另外两部还没有完成。我想把我写的小说中成功的地方，失败的地方，也有高兴的时候，也有难受的时候，给大家讲一讲，说说心里话。讲讲自己的感受，也许很片面主观，意见也许很不成熟，不对的地方，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给指出来，批评，帮助我。

我的题目是：“我写长篇小说的创作体会。”我讲的第一部分就是有关《青春之歌》的。

先讲我为什么要写《青春之歌》。这部书有很多同志都看过了，比较熟悉。读者也想知道作者是怎样写的，为什么要写。

创作离不开作者的生活基础。我自己在一九三三年因为偶然的機會接触了共产党，那时我在北京是一个失学失业的学生，因为家庭的破产，我只念过三年初中，毕业后就没有办法再上学了。我很喜欢读书，可是不能读了，当时精神非常苦闷，觉得没有出路。我看不惯那个旧社会，也看不惯自己的家庭。可又找不到出路，那时我只有十七岁。我当时象《青春之歌》里描写的林道静那样，厌世，对人生悲观

失望。我真的去北戴河海边上去找一个亲戚，找工作。因为家里逼我去嫁一个小官僚，我不愿意，我有一种清高的思想，觉得应该保持自己的人格，不能出卖灵魂。可是在北戴河还没有找到工作时，所以我确实想自杀，多少次想跳海。就和小说中描写的林道静那一段情况相似。

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帮我在河北省香河县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，这时我就回到北京来了。我当过小学教师，也当过家庭教师，总之自己总想独立谋生，不想依靠家庭，也不想做一个出卖灵魂的人。这是三一年的事情。到一九三三年，我偶然地认识了革命的同志，进步的青年，其中也有共产党员。他们给我一些革命的书看，给我讲革命的道理，一个青年应该怎样爱国、救亡。我受到影响，思想就开始转变了。改变了过去悲观厌世的思想，我觉得一个青年应该活得有意义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。

一九三三年以后，我一心想找到党参加革命，但白区的党百分之百都被反动派破坏了。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被捕了，有的牺牲了，也有的不知上哪儿去了。我当时没有机会找到党，没有机会参加革命。恰巧我认识一个同志，他被捕以后，我找到了他的母亲，我就装作他的妹妹，跟他的母亲经常去探监。他们知道我向往革命，就给我一些任务——帮他们向狱中传递东西。他们需要笔写字，我就把馒头里放进铅条；蒙过看守的眼睛还把一些进步的书伪装一下送给同志们。那时候也不知道害怕，象初生的犊儿不怕虎。觉得能为革命同志做一点事很高兴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以后，地下党逐渐恢复了，我就在北京入党了。三七年，日本大规模进攻，我扔下了自己刚有几个月孩子，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。

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经历了这些生活，就给创作打下了基础。所以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我自己的感受确实是这样的。

我为什么要写《青春之歌》呢？就是当后来（抗日战争时期）我爱好文学，虽然水平不高，但我很想把认识的，或间接听到的，或直接接触的革命同志英勇奋斗，不怕牺牲的精神写出来。常常想：等将来我一定写一部小说。表现这些崇高的人物。那时我根本没写过长篇小说，（连短篇都写得不怎么好。）而且随时都有可能牺牲，根本没有条件写。将来写，是我当时的热烈希望。

八年抗战，加上三年多的自卫战争，我都是在河北省的农村度过的。那时接触到的革命同志更多了，包括很多工农干部，也有知识分

子的干部，使人感动的东西就更多了。有的同志我们今天还在一起，过两天就传来消息他们已经牺牲了。一方面我很悲伤；另一方面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。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。他们没完成的事业，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接着干下去。但那些牺牲的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很深的。我总想在将来有个机会表现一下他们。这也算是我写《青春之歌》最早的动机吧。

那时我们住在老乡家，吃在老乡家。有多少次我被日本人给包围了，很危险，都是老乡掩护了我。如果没有群众，就根本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一方面，这些生活改造了我的思想感情，——因为我原来还是有些瞧不起农民群众的。觉得他们没有文化，好象我比他们高明。到村上工作时，都是向他们夸夸其谈，讲一套大道理，教育人家。可是后来我觉得自己反而是被这些群众教育过来的。这段生活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同时也是饱含着血和泪的。我觉得这许多高贵可爱的人，我也应当把他们表现出来。

要是没有党，也许我早就堕落了，或许早就死了，所以我感谢党。没有党，就没有我这个人，更不会写出《青春之歌》来。

以上是我为什么要写《青春之歌》的原因。

第二方面讲一讲我写《青春之歌》的经过。我们这里边有喜爱写作或从事过写作的，还有爱好文学的，请大家听听也可能会有点启发。

这个经过也是“七灾八难”吧，不是很容易的。我自己文化的底子很薄，只是十岁以后看过一些小说，开始是中国小说，上中学后，就看了大量的中国现代小说，郭沫若的，郁达夫的，后来也看鲁迅的，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。那点文学底子都是在二十岁以前打下的，抗战以后十几年根本没有读过什么文艺作品。

四九年，进北京，以后我也不是做文艺工作的。这多年都在报社，或是在妇联会做群众工作。我开始写东西时，还是没有条件。后来因为我生病了，倒是沾了这个生病的光。生病给我带来很多的苦恼，耽误了我很多的时间，但也是由于生病，完全休养了我才有工夫写起长篇小说来。

多年来，许多人物总在我脑子里转。许多英雄总想表现他们。但想写时，也有许多困难。一个是为因底子薄，要想写一个长篇不是很容易的。艺术上的修养，文字上的表现都很差。但我有一种激情，有一种热烈的向往，我一定要把那些人写出来。

五〇年开始酝酿，五一年开始动笔，五二年就写得差不多了。当时我把组织关系转到街道上，和北京拉三轮的、家庭妇女、小贩等在一

起，在街道上的支部过组织生活。除此，在养病中，我就找懂文学的同志帮我看，提些意见，帮助我修改。我不断地改来改去，小说的真正完成在一九五六年。在这五、六年的工夫，反反复复不知改了多少遍。光是林道静上北戴河的开头那段就改写了好多次。一个人只要有决心，有毅力，能够听取同志们的帮助意见，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，我觉得总是可以改好的。我一开始的稿子还不到二十万字，后来第一次出版时就有三十七万多字了。第二版时，又加进一些内容，就有四十多万字。出版以后我又改过两次。

我觉得天才恐怕还是勤奋中来的，我不承认我有天才，我这个人挺笨的，我所以能够写出来，主要的还是自己有这个愿望，这个决心，还有就是能够吸取同志们的意见和帮助，能作反复地修改。我的经验是改一回就好一点。五六年出版社说可以不必改了，可是我又听了点意见，我还是又改了一些地方。最后才在五六年一月出版了。

我在《后记》里说，这本书虽然是我写的，但是也是很多人帮助我写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劳动，我是真心这样来看的。

我有生活，我有感情，我有有利条件，如果写好了，就比较能打动人。我的不利条件就是底子薄，文化水平不高，我努力读书，学习人家的长处，想办法克服不利条件。终于才能使我这本书出版后能受到许多同志们的欢迎。

我所以能写出这本书，还有一个原因，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对我来说却是个很关键的问题。我写《青春之歌》时，我的病特别多，一个是严重的关节炎，有时躺在床上不能动，几乎连走路都困难。还有一个我动了妇科手术，神经不正常，一夜夜的失眠，经常头痛得要命。时常一天到晚跑医院治病。我读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保尔那种顽强精神鼓舞着我，我每天躺在床上，拿块板子垫着稿纸写，坚持不懈地写。那时养病，不上班，有的人就瞧不起我，好象是个废物，是个长期病号，白吃国家的大米。我也曾饱尝了被人轻视的滋味。在养病当中不能工作，只给组织上添麻烦。我内心是痛苦的，但一切打击不能动摇我的决心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，自己还是坚决写下来。克服了疾病的折磨及精神上的压力等重重困难，我终于还是把书写出来了。

我很羡慕现在我们这些学员同志们，就象生活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，有人帮助，有人指导，但是我呢？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的一棵小草。我从事写作不是很顺利很容易的，你们的条件比我好多了。我写那时候国家刚解放，经济很困难，我还有几个孩子，他们也累赘我，又当妈妈，又是个病号，水平又不高。……

写东西，要写自己深深被感动的，对它非常有感情的；要写的人物是自己非常热爱的。写作也象结婚，没有恋爱的结婚就不幸福。我写的《青春之歌》，我非常爱书里的那些人物——当然是些好人，我也认识一些坏人，也写进去了。象卢嘉川这个人，其实我生活中并没有这么一个人，我认识很多同志，我把他们身上的很多优点集中在卢嘉川身上，创造了这么一个人物，但我是带着深的感情来写的。卢嘉川牺牲前给林道静写信时，我哭了好多回。

当时我不懂也没有想到什么主题呀，情节呀，结构啊等等，创作上的专用名词，我没有想，我所想的只是一个个生活的人物，和这些人物的命运。一本书，如果想打动读者，感动读者，首先作者本人就要感动。我相信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时，他一定是很动感情的。因为里边的许多人物都是他熟悉的人物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保尔由于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他写出来就比较有感情，也能打动人。

我写时，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，象一张白纸一样，只想着把人物表现出来。我写起来也是比较大胆的。那时知道白桦同志，我同他一道在北戴河休养，我正在写《青春之歌》，很多人都劝我：你怎么以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主人公？有点危险，你不怕冒风险吗？我那时没有害怕，我心里总是记着鲁迅说的一句话：“从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水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。”我觉得自己对党很有感情，是热爱的，我是不会写出反党的作品的。所以我就大胆地写下来了。

现在讲“五美四美”，我想“心灵美”恐怕是最根本的一条吧。什么叫美呢？我的理解，美主要是真实。我小说中的人物就是抓住了这一点。我很多熟悉的同志为革命牺牲，前赴后继，他们的品质是高尚的。我被他们的心灵的美打动了。书中我写了林道静、林红外表的美，北戴河大海的美，关键的不是这些外在的美，而在于表现了人物心灵的美。比如写卢嘉川在监狱里那一段，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就要牺牲了，但不是给人阴森的感觉，而是让人感到他品质的高贵。这样写的效果是比较好的，书刚出版那几年，有些女孩子给我写信，告诉我她们在南京的雨花台去找卢嘉川的坟墓。我去年到了雨花台，那里的接待人员告诉我，还是有人不断地来问，卢嘉川的坟在哪儿。最近还接到一封信，很有意思，有个女孩子说，我可惜没生在那个时代，否则，我一定要嫁给卢嘉川。……

六一年时，《青春之歌》已经翻成日文了，一些日本青年看过此书后，联名写信给日共领袖，要求参加日本共产党。……

我觉得，一部小说，如果把人物写活了，把他精神上的力量写出来，是可以感动人的，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力量。当然现在看来这部书也是还有不少缺点和毛病的。

下边我想谈一谈《东方欲晓》的写作问题。因为一个人不能只看到自己成功的一面，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或者是失败的一面。

《东方欲晓》现在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包袱，很重的包袱。欲罢不能，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

文革时，《青春之歌》到处受到批判，我没有勇气继续写下部。但我又想写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，于是就另起炉灶，写了《东方欲晓》。从七三年一月一号动笔，一直写到七六年的九月份，四年多时间，写了七十万字。我写的时候还不觉得，实际上不知不觉已经受了“四人帮”的影响，如“三突出”那一套东西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尤其是“三中全会”以后，思想上的解放，文艺上的繁荣，我逐渐发觉自己写的那个作品有不少问题。

每一个作者都有所长，有所短，我应该扬长避短。自己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能驾驭些，写得真实些。这书那就应当仍写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题材，开始时，我还是以改头换面的林道静，——女大学生柳明作为主人公来写的。后来报纸上登文章说，不能让成长中的人物，中间人物当主人公。必须是高大的英雄才能当主人公。于是我迷失了方向，自己没那个胆量继续那样写了。于是，我把开头写的十八万字重新改了，让一个工农出身高大无比的人当了主人公。这人高大是高大，可后来一看，却并不可爱。人们鼓励过我，希望我再写出一个卢嘉川来，可是我费了老大的劲写出来的人物不真实，不可爱。这就是一个失败。有的同志看后对我说：“你糟塌了材料了。”说得我心里真难受。

随着我的思想和解放，文艺观点的端正，才觉得这本书确实是写糟了。按生活来说，我这段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是比较丰富的，它应当比《青春之歌》写得更好些才对。然而，相比之下，因为写作方向的不对头，把它写糟了。但我有决心，要下功夫尽力改好它。这才对得起人民对我的期望。

论文学创作的真实性

白桦

去年这个时候，在个旧作过一次发言，整整一年了，今天发言之前，我是很惶恐的，昨天准备了一天。因为关心我的人很多，所以我现在讲话必须每个字都写出来，特别不敢当的，就是今天在座的许多我的老师，尤其是丁玲同志，赛先艾同志，都是老前辈了，丁玲同志著书的时候，我还看不懂书，五十年代初，我是正式拜过师的，所以她是我的老师。本来我一再说，请丁玲同志休息，这个讲话，当着前辈的面是讲不出的。她一定要来，来听一会，我觉得这样也是对我的关心吧。我在讲话当中有错误的时候，希望这些老前辈，包括茹志鹃同志，还有这里比我年轻的作家给我提出意见和批评。

我今天讲题目比较单一点，比较专门性一点：谈一谈文学创作中的真实。因为我们中国文学界，包括观众、读者，近一些年，不断在谈这个问题，就是真实问题。尤其是电影文学领域当中，电视里也谈得很多，虽然很多，但在大量的电影文学作品和电视里边还存在不真实的问题。但这个题目在我来谈，是个很难的难题，大概有一点自不量力，我想把我思索过的关于文学中的真实问题谈一谈，请大家批评。

我以为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谈文学作品中的真实，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下面我分这样几个小的题目：第一个，关于文学中真实的讨论的回顾。就是我们回顾一下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在近年来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。

我记得，从五十年代开始，我国文学界就进行过相当长时间对于写真实的讨论，甚至于后来发展为对于写真实的批判。在讨论的过程中，有不少的论点，诸如：认为写真实就必然与阶级观点相矛盾，写真实必然会滑向资产阶级，写真实等于自然主义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许多绝对违反现实主义的观点。这一讨论，产生了很深远的不良后果，以至发展为到后来谈“真”变色。就是一提到“真”就吓人一跳。有些稍稍接触一点生活真实的作品，一出现，就怀疑它的正确性，好象真实和正确也是矛盾的。好象一个是“冰”，一个是“炭”，